

容闳与康有为

刘玉全

容闳是近代史上著名的留学先驱，享有留学之父的美誉，康有为是近代史上名噪一时的维新领袖，两人同为广东人。容闳 1828 年出生在广东香山县南屏村（即现在的珠海市南屏村）的农民家庭，康有为 1858 年出生在广东南海县（即现在的广州市解放路附近）一个官僚书香家庭。容闳比康有为年长 30 岁。1872 年组织 120 名幼童赴美留学分 54 批前往，也是容闳率领。康有为才 14 岁，正在广州参加一年一度的童子试。两人虽然出身不同，年龄也相差 30 岁，但御侮图强的时代呼唤，这两代社会名流携手走到了一起，从京师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到南洋策划血雨腥风的庚子勤王起义，乃至流亡海外的保皇生涯，容闳与康有为在十几年当中经历了相互支持到密切合作，最终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梳理容闳与康有为的恩恩怨怨，可以看出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历史名人留下的鸿爪雪痕。

一、南洋密切合作策划庚子勤王起义

先从容闳与康有为在南洋组织庚子勤王起义说起，1900 年 1 月 24 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与权

臣荣禄，经过一番策划，公然发布上谕，要立端王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准备继皇帝位，光绪被废似已成定局，史书简称为“己亥建储”。消息传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以及天下豪杰维新仁人志士摩拳擦掌，奔走呼号，决心乘机武力讨贼，总之，各派反清组织以武力勤王已达成共识，这就是庚子年汇集各派反清力量的庚子勤王起义。国内长江流域实际指挥与策划的是湖南维新志士唐才常，保皇会海外总联络部设在澳门，梁启超的任务是在檀香山负责筹款工作，而由康有为坐镇新加坡主持一切。所以包括流亡日本的革命党孙中山、国内的维新志士容闳、丘逢甲等都来到新加坡与康有为商讨勤王起义事项。康有为有诗为证：

德星光怪聚星坡，
中外歌诗慷慨多。
合沓蛟龙会云气，
共伤故国起山河。

康有为的诗在近代诗歌史上独具一格，绝少风花雪月之句，多是忧时忧国悲壮之词。这首诗是 1900 年 3 月底康有为与容闳、丘逢甲等在新加坡南华楼聚会商量庚子勤王起义的形象记叙。诗前有一小序：“容纯甫观察、丘仙根总统、王晓沧广文来星坡，与林文庆议员并集南华楼，林君赠我西文诗，即席答之，并索邱王二子合作。”

序中的容纯甫即容闳，观察是晚清对道员的习惯称谓。仙根即丘连甲的字，称呼丘为总统颇有一番来历。1895 年，甲午战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出，激起全岛一片愤

恨。丘逢甲愤然召集台湾乡绅咬指血书“抗倭守土”四字，为抵制割台，丘倡议成立“台湾民主国”，推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自任副总统兼领义军大将军。后来被日本残酷镇压，丘逢甲随义军溃退大陆。而此时康有为正极力动员丘逢甲收拾旧部，举行庚子勤王起义。所以此时康有为称呼丘为总统，用意深远。

康有为、容闳与丘逢甲等聚会商议之后，逢甲即回到广东嘉应州一带准备响应庚子勤王起义，而容闳则受康有为的委托，负责起义前后与英美等列强进行外交交涉。容闳先到新加坡当局探询英国殖民者对保皇会武装起义支持的程度，英国当局鉴于他们在华的利益，正密切关注北方兴起的义和团运动，以及慈禧太后的对外政策，一方面利用康有为对保皇维新活动表示支持，一方面对武装勤王起义表示不赞成。容闳了解到英国当局的态度，很快来到香港秘密拜会了兴中会首领杨衢云、谢纘泰，了解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起义活动，又于1900年4月4日乘“中国皇后”号邮轮赴夏威夷檀香山。

原来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此时正在檀香山积极为庚子勤王起义筹措资金。梁启超在檀香山遇到了两个难题，所以他盼望精通西学的容闳赶快来一趟，以决疑难。第一个难题是梁启超想的很远，他预计勤王起义成功后，必要设立临时政府，需有庞大资本支撑，所以与日本友人柏原文太郎合作倡设东亚银行，资本金就靠在檀香山募集的股金三四十万。梁启超知道容闳在美国深入研究过开办银行的章程与细则，急切咨询。第二个问题是梁启超在檀香山筹款期间，结识了美国商人赫钦，此人自称与本国现任国务卿有旧，能说

服美国国务卿借款一千万美元，支持清国维新派的武装起义。梁便以二万重金作酬劳，请其归国活动，希望能得到美国的借款一千万。梁启超并由此大生奢望，认为此举若能如愿，不单勤王经费可以解决，而且美国既对勤王运动投下如此巨资，一定会全力相助。容闳来到后很快发现所谓的美国商人赫钦设的是骗局，好在梁启超只给了他两万元。而开办银行需要巨额资本，梁启超当时仅募捐了四万元，所谓的四十万只是认捐，远没有到账。

容闳与梁启超又商讨了勤王起义的准备事项，梁启超与康有为明显的不同是，康有为反对与孙中山联合，而梁启超则主张积极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联合举行武装勤王起义。梁的这一主张，对唐才常、容闳策划汉口武装起义时与孙中山密切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容闳又很快马不停蹄于7月初回到了上海，与康有为派遣回国筹备勤王起义的唐才常会见。

1900年容闳已经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庚子勤王起义前两三个月他从新加坡回到香港，立即赶往檀香山，又从檀香山回到上海，当时的交通工具全靠轮船在海上颠簸。所以丘逢甲在《星洲喜晤容纯甫副使即途西行》三首诗道：“吾国有爹业，将为欧美游”，“七十尚如此，吾徒愧壮年”，“风云看勃郁，万里途飞轮”。丘诗的确是容闳当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容闳回到上海，与唐才常等商议先成立一个合法组织，即中国国会。在容闳、唐才常、汪康年等人的联络活动下，各省在沪社会名流纷纷响应入会。1900年7月26日，中国国会在上海愚园南新厅宣告成立，到会的有严复、章太炎、

文廷式、张通典、马相伯、毕永年、容星桥、林圭等 80 多人。容闳当选为会长、严复当选为副会长。据亲临大会者孙宝瑄当时的日记记载“乃投票公举。正副会长，令人各以小纸自书心中所欲举之正副姓名，交书记者。书记收齐点数，凡举正会长以举容纯甫为最多，计四十二人；举副会长以严又陵为最多，计十五人。于是容、严二公入座。容公向大众宣讲宗旨，声如洪钟。在会人意气奋发，鼓掌雷动。”会议通过了不承认通匪矫诏之清政府、请光绪复位等主题，容闳还起草了英文对外文告八条。容闳在众多社会名流中当选会长，与康有为、孙中山的暗中支持不无关系。他俩当时都想借重容闳的声望，联合各派反清力量，发动庚子勤王武装起义。

不久，在容闳的支持下，唐才常、林圭又组建自立会，在汉口秘密组建自立军，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但由于康有为募捐的军费迟迟汇不来，唐才常屡屡推迟起义日期，结果被湖广总督张之洞破获，于 1900 年 8 月 22 日，秘密杀害唐才常、林圭等起义首领 20 多人。接着张之洞又发出《宣布康党逆迹并查拿自立会匪首片》，公开通缉容闳等匪首，其中说道：“容闳往来港澳，勾结盗匪，订期起事。枪炮由南洋用棺材装运入粤，若不查办，有碍东南大局。”并电饬新加坡、香港总督，严密查拿拘禁。

从 1895 年初夏容闳应张之洞的邀请，怀揣着新政救国方略回国，成为张之洞的座上客，转眼又被张之洞通缉，即将成为湖广总督的阶下囚，容闳只得走上逃亡之路，而康有为则远远逃往印度避难。也就是在逃亡的路上，容闳结识了孙中山，由此，开始了与孙中山合作组织反清武装起义。

二、北京积极支持康有为维新变法

有人感叹，容闳一个将近 70 岁的老人，虽然不是大富豪，但当年在美国衣食无忧，完全可以安享晚年。盖容闳非常人也，当他看到自己的祖国被日寇侵略，沉沦没落，即将被列强瓜分豆剖，容闳忘记了清廷对自己苦心经营幼童留洋事业的打击，仍鞍前马后为挽救这座将倾之大厦作不懈的努力，并积极支持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慈禧太后一巴掌将戊戌变法拍得粉身碎骨，康有为流亡日本，容闳遭撤职查办。这一事件是容闳人生的拐点，容闳从此走上武力反抗清政府的道路，也是逼上梁山的。

1895 年的春夏之交，正是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之时，应主战派张之洞的邀请，容闳怀揣着救国新政方略，告别寓居 13 年的美国回到上海，很快，容闳就奔赴南京拜见张之洞，献上新政救国方略。但对容闳建议聘请外籍专家担任政府外交、财政、海军、陆军顾问，按照西方的管理模式实行新政改革，张之洞则顾左右而言他。容闳看张之洞并无实行新政改革的诚意，也辞去了张委之以江南委员的职位，重返上海，寓居在虹口同文书局。

此时，康有为正在北京以举人的资格参加会试，《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康有为声泪俱下，振臂高呼，反对朝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联络广东、湖南等在京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上书指出：日本割让辽东、霸占台湾是列强瓜分中国的信号，亡国危机迫在眼前，国内哀鸿遍野、群盗满山。面对内忧外患，康有为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之后，康有为在京师奔走呼号，联络京师宫绅

士大夫阶层，创办《中外纪闻》报，组织《强学会》，宣讲变法图强、保国保种的维新理论，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引起强烈反响，自然也引起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康有为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于1895年10月离京出走，11月到达上海，组建《强学分会》，出版《强学报》。很快，慈禧太后下诏查封《中外纪闻》，解散《强学会》上海的《强学分会》和《强学报》也被张之洞勒令查封。这时候，容闳正在上海寓居在虹口同文书局，一心一意翻译《美国银行法》，还没来得及会见康有为，康有为就匆匆离开上海，回广州万木草堂讲学去了，

到了1896年3月份，梁启超受康有为的指派，来到上海，与汪康年、黄遵宪商议合作创办《时务报》，并聘请社会名流谭嗣同、章太炎、严复、容闳等为撰稿人。这期间，容闳与梁启超有了接触，梁启超给康有为的信中介绍说：“容纯甫在此数见，非常人才也，可以为胜广。”从梁启超给康有为介绍容闳的这短短一句话中可以看出，康梁在当时维新变法运动中隐隐以刘邦、项羽自居，他与容闳的接触中感到，容闳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可以作陈胜、吴广这样的开路先锋。

而此时的容闳，正心无旁骛地作着科教兴邦强国梦想，不停地往返于京沪之间。在北京，他寄居在老朋友，也是广东同乡户部侍郎张荫桓的家中。经张荫桓穿针引线，给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和建言，筹备成立大清户部银行，以解救因甲午赔款而带来的财政危机，并呈上《银行总纲四条》、《总行章程十二条》及实施细则。同时，容闳还上书与美国商界合作成立公司筹款，建立全国铁路的计划，均受到翁同和的重视，但最终被大官商盛宣怀夺走先机。容闳毫不气馁，

于1897年冬再次奏请翁同和准许自设公司专办津镇铁路，修建天津到江苏镇江的铁路，得到翁同和的支持，而且经总理衙门批准，获得筑造铁路的特许权。但由于德国等列强的反对和盛宣怀的作梗，津镇铁路计划再次告吹。从容闳这一时期的活动看，他与康有为走的仍然是两条路：康有为祭起维新变法的旗帜，以挽时救国为标榜，奔走天下。容闳引进美国经济管理模式，列二银行、办铁路，走的是科教救国的路子。

1897年11月12日，德国以巨野教案中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为借口，出兵侵占胶州湾，这个突然的军事行动，给清廷朝野极大的震动。胶州湾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康有为一看时机来到，于1897年底整装从广东进京，向朝廷呈递《上清帝第五书》。康有为沉痛指出：自德国强占胶州湾，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中国现在譬犹地雷四伏，一处火燃，四处皆应，瓜分危险就在旦夕，如不赶快变法，皇上与诸臣虽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

康有为说出了那个时代广大士绅知识分子想说又不敢说的话，《上清帝第五书》犹如一颗巨石投入湖水，激起阵阵波澜，京师士绅官吏广为传抄，也终于冲破层层阻挠，转呈光绪皇帝。光绪皇帝看了《上清帝第五书》大受感动，再加上帝党官员翁同和、杨深秀、高燮曾的推荐，光绪帝准备召见康有为。但由于恭亲王的反对，光绪帝下旨由总理衙门李鸿章、翁同和、荣禄等六大臣与之会见面谈。一个小小的六品工部主事，却被皇帝下旨令朝中六大臣问计新政变法，

这真是大清国破天荒头一次，康有为再一次在京师被捧起走红，名声大震。

容闳呕心沥血建议朝廷开银行、办铁路的计划从 1896 年初到 1898 年这艰苦卓绝的两三年中间，都是眼看快要成功之际，却终归失败，容闳十分失落。在《西学东渐记》中容闳吐露心声：“予之种种政策，既皆无效，于是予救中国之心，遂亦至此而止矣。”康有为此时受到户部尚书翁同和的青睐与支持，再加上户部侍郎张荫桓的同乡之谊，与容闳已经是经常聚会往来的朋友，他深为容闳抱不平。康有为特地代御史杨深秀草拟奏折，建议朝廷再招商继续办理津镇铁路，“唯津镇一路，关系东南半壁利权，办理尤宜迅速。昨闻容闳承办此条铁路，计时已经半载，而所筹备款项，至今尚无把握，若迟延数月，无人承办，诚恐为洋商所夺，而大利转归外人。”

康有为还多次向朝廷推荐容闳，而容闳也开始为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出谋献策。当时容闳住在三条胡同金鼎关帝庙，康有为则寄居南海会馆，两人相距不远。《西学东渐记》里记载：“予之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康有为 1898 年 4 月酝酿成立保国会，4 月 17 日，保国会在北京南横街粤东会馆第一次集会，由康有为演讲俄罗斯问题，容闳也亲到会场表示支持。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要给朝廷上书许许多多的新政新法。所谓的新政新法，自然是以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管理模式为嚆矢。康有为这时候还没有到过欧美考察，仅仅是依靠洋务知识分子翻译过来的书籍为凭依，对于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自然是形同隔膜。容闳恰恰弥补了康有为的不足，从 1897 年底康有为进京到 1898

年9月戊戌政变爆发这一时期，容闳与康有为的接触日趋密切。

容闳为康有为设计了一个以美国为依托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方案，康有为顺理成章把容闳的改革方案草拟成奏折，转交给维新派关系密切的御史向朝廷上折，其中著名的有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奏请开办一大公司，集款数万万，准其开办各省铁路矿务的奏折中说道：“臣查中国民穷商匱，不能举此，于万国之中，美国最富，又不利人土地，召集美商办此，彼必乐从。唯须得该国敬信之人，方能召集。臣闻江苏候补道容闳，少年游学美国，壮岁又奉使差，久于美地，前后二十余年。其为人朴诚忠信，行谊不苟，深为美人所敬信，若容闳往美召集，必有可成。”

与此内容大体相同的奏折，而由京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向皇上呈递，奏折的主题是解除中国面临的危机，唯有向美国多借款，才能对列强起到牵制作用。“美富埒于法，从不肯占据他人土地，专重商务，所养之兵，为数不多，但竟竞以护商为心，各国皆交相畏之。若酌拨长江省份及法德屯兵附近各处之厘金作为抵押，美必允从，将来各国俱不能进步，无不受其牵制。但必须得美商信服之人，方易集事。查江苏候补道容闳在美读书多年，官商推重，如遣与美商速行订借二三万万两，一月之内，必可有成。事关保国大计，用敢迫切上陈，伏乞皇上圣鉴施行。

无论是宋伯鲁还是陈其璋，他们本身都是推行新政、力主变法的御史，与康有为同声相求，往来密切。此二折系由康有为捉刀代笔，康氏于1899年在日本撰写的《自编年谱》中坦言：“既与常熟言，荐容纯甫熟悉美事，忠信可任借款。

又草折二份，交御史宋伯鲁、陈其璋上之。枢垣疑其不能行，留中，真可惜也。”由康有为代拟的奏折内容可以判断，维新派所谓利用外资，成立大公司，集资数万万，购买铁甲舰船，设水师学堂，延请洋将，练兵百万，开银行，办铁路乃至开议院、设议员等等，无一不出自容闳之手。否则，康有为也不会多次向朝廷推荐容闳。这也为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太后下旨撤职查办容闳埋下了祸根。

1898年9月下旬，帝后两党到了水火不容、生死对决的地步，维新派在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欲联络袁世凯训练的新军作孤注一掷。容闳的金鼎庙寓所，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秘密开会议事的场所。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只身前往法华寺袁世凯住地，游说袁世凯起兵杀荣禄，围颐和园，拘捕慈禧太后。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载，“复生(谭嗣同)入城后，卓如(梁启超)至金鼎庙容纯甫斋(即容闳住宅)处候消息”；至子刻内城开，吾亦入城，至金鼎庙候消息。”还记一条：“容纯甫欲请美钦差，然以其无兵，无济于事，却之。”

1898年9月20日，慈禧太后由圆明园潜回紫禁城，第二天，9月21日，发布诏书，宣布临朝训政。并下令拿办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幽囚光绪帝于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仓皇逃往海外。28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六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时称戊戌六君子。因为梁启超曾经担任集传教、政客、洋务顾问于一身的英国人李提摩太的汉文秘书，在维新人士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容闳利用他特殊的身份，曾致函英国人李提摩太的秘书程涓求救：“政府緹骑四出，梁氏(梁启超)甚危，能为之地否？”并

且容闳还以美国公民的身份，求见美国公使田贝，请设法保护光绪皇帝和维新派人士。在戊戌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之中，容闳挺身而出，竭尽所能救助康梁维新人士，其胆略志向，可见一斑。

9月28日康有为逃到香港，慈禧太后通过外交渠道向港督施加压力，康有为不得不于10月19日离港逃往日本，行前写信给在京的李提摩太，托请代收康广仁遗骨，并请航运至香港。同时，另有一函写给容闳，“另函致容纯甫者，望代妥密交，各情并告知，此函亦并示之。”康有为深知在以后流亡海外的生涯中，不懂英语，从事政治活动，甚是不便，他想起了比较可靠的老朋友容闳，想让容闳来到他身边，为他作英文翻译。容闳在国内的日子也不好过，大学士徐桐是顽固派后党的核心人物，他在弹劾维新派的奏折中称容闳行动诡秘，应予惩办。容闳只得远走上海，躲进英租界栖身。

三、去向不同、分道扬镳

容闳避居在上海英租界期间，与上海的维新派人士唐才常、汪康年、经元善等秘密往来，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互通声气，随时准备起事，直到庚子勤王起义失败，容闳不得不逃到日本、台湾和港澳等地避难。此时清廷加大了对康有为的通缉力度，日本当局在清廷答应的优惠条件下，开始对康有为施加压力，康有为只得远走美洲大陆。而此时的容闳，并没有随同康有为西行，而于1900年10月，参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在惠州举行的三洲田武装起义。起义很快被清廷地方官军残酷镇压，容闳再次被当作国事犯通缉，只好隐居在香港这块化外之地。接二连三武装起义失败的打击，促使

容闳屡奋屡挫中痛定思痛，开始总结自己一生参与洋务运动中创办江南制造局、率领幼童赴美留学，戊戌变法失败，自立军武装勤王夭折，协助孙中山举行暴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经过认真思考，容闳的思想这时候发生了质变，表现在：一方面他对清政府的幻想彻底破灭，另一方面，对康有为的保皇理论产生怀疑，而对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予以同情和支持。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容闳开始动笔撰写一生的回忆与总结《西学东渐记》。1902年春天，容闳的长子容覲彤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了，覲彤来信要父亲出席他的毕业典礼，再加上这几年栉风沐雨，为武装起义奔波，得了咳嗽气喘病，容闳决定回美国治病，休养生息。1902年5月初，容闳回到家乡南屏村，祭拜容氏宗祠，告别乡亲。他知道，这一走，恐怕再也难以看到家乡的山山水水，再也难以闻听乡邻乡亲的音容笑貌，1902年5月16日，74岁的容闳怀着依依不舍之情，踏上了驶向美国的“盖尔”号轮船，开始了他晚年寄居美国的生涯。

回到美国后，容闳有时间坐下来撰写回忆录，他晚年曾用毛笔抄录刘禹锡的《岁月咏怀》这首诗，很能表现他这时的生活境况：

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
年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
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
春色无情故，幽居亦见过。

而此时的康有为则正在欧美等国游历，一方面继续宣传他的保皇理论，一方面与孙中山的革命党展开论战，但明显处于颓势。从1903年初，康有为游历了法国、德国、意大

利等西欧十几个国家，1905 年来到美国，容闳与同情支持维新革命的美国军事理论家荷马·李一同在哈德福市会见了康有为。康有为早在 1900 年庚子勤王起义失败后，为推卸责任，抱怨容闳与荷马·李花费浩大，筹借款项不落实而贻误大事。现在又对容闳与荷马·李在美国帮助保皇会筹集款项太少而不满。这次会见，双方都没有留下详细记载，与 1903 年梁启超游历美国时，容闳几乎是全程陪同，并一起拜会当时的美国总统，参观耶鲁大学，会见当年的留美幼童，其热烈亲密与康有为的简单会见大相径庭。而 1907 年 3 月保皇会在美国召开“帝国宪政会”，康有为特地从欧洲赶来莅会，隆重热烈，盛况一时，但却没有通知容闳参会，这说明容闳与康有为的关系逐渐疏远，而最终导致容闳与康有为分道扬镳，则是 1909 年发生的刺杀刘士骥一案。

1909 年夏，容闳派长子容觐彤随同前来美洲向华侨招股开矿的广西道员刘士骥回国。刘士骥早年也是维新志士，戊戌变法时与康有为一起为国事奔走。1908 年保皇党派叶惠伯、欧榘甲、刘汝兴、梁少闲、刘义任五人与刘士骥一块到美洲招股，由保皇会拨款七千元作为他们的路费与活动经费。刘士骥等在美洲招股大获成功，募得股金 300 万，并聘请矿物技师容觐彤回广西开办矿务。康有为指示大弟子徐勤要求刘士骥留下一半股金用于保皇会办实业，被刘士骥一口回绝。康有为、徐勤派人于 1909 年 5 月 27 日暗杀了刘士骥。这一案件，不但导致了容闳与康有为的彻底决裂，从此分道扬镳，并且引来国内一大批维新志士的责难声，而这种用暗杀手段对付同党的行为，恐怕也是康有为保皇派在清末和民初迅速丧失政治活力的原因之一。

在美国生活的最后 10 年，容闳虽然年事已高，远离祖国，不能亲身在国内参加革命党举行的武装起义，但他从未停止关心祖国的革命运动。1910 年，他写信给国内的同盟会谢纘泰谴责康有为及其保皇派，转向支持孙中山民主革命。容闳支持孙中山武装起义另文叙述。梳理容闳与康有为从戊戌变法到海外奔走这十几年的交往关系，可以看出，这两位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社会急剧转型期涌现出的风云人物，容闳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一直紧跟时代的潮流，与时俱进，而康有为却固守保皇观念，直至到民国还对清室顶礼膜拜，显示其愚忠与顽固，何其悲哀也。追根寻源，容闳与康有为是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熏陶与成长起来的改革家，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课题。